

路海洋 著

社会 地域 家族：

清代常州古文与骈文研究



凤凰出版社

社会 地域 家族：

清代常州古文与骈文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 地域 家族：清代常州古文与骈文研究 / 路海洋著. —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5506-2059-9

I. ①社… II. ①路… III. ①古典文学研究—常州市—清代②骈文—文学研究—常州市—清代 IV.
①I206.2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8366号

- 书 名 社会 地域 家族：清代常州古文与骈文研究
著 者 路海洋
责 任 编 辑 李相东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hs.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徐州市青年路公园巷2号,邮编:221003
开 本 652×960毫米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72千字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2059-9
定 价 42.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6-82328908)

序

罗时进

多年前,当我开始关注地域文学研究时,因为“在地”的原因,自然将“江南”纳入了研究范围。在我的江南视野中,常州一片是突出的文化高地。尤其在清代,常州是一个极为兴盛的知识产地,极为繁荣的文学家园。我甚至认为,从文化存在、文化能量的意义上看,清代常州不是“江南”所能涵盖的,她拥有一个庞大的文人部落,其影响力覆盖了中国文化版图的多个领域,在中国古典文化发展史上有其独立的意义和地位。

若论清代常州文人部落之群星闪耀,人们一定会想起龚自珍的《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恒》:

丁君行矣龚子忽有感,听我掷笔歌常州。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我生乾隆五十七,晚矣不及瞻前修。外公门下宾客盛,始见臧顾来哀哀。奇才我识恽伯子,绝学我识孙季逑。最后乃识掌故赵,献以十诗赵毕酬。三君折节遇我厚,我益喜逐常人游。乾嘉辈行能悉数,数其派别征其尤:易家人人本虞氏,嵒纬户户知何休。声音文字各突奥,大抵钟鼎工冥搜。学徒不屑谈贾孔,文体不甚宗韩欧。人人妙擅小乐府,尔雅哀怨声能道。近今算学乃大盛,泰西客到攻如讎。常人倘欲问常故,异时就我来咨諏。勿数荀董数平辈,蔓及洪管庄张周。其餘鼎鼎八九子,奇人一董先即邱。所恨不识李夫子,南望夜夜穿双眸。曾因陆子屡通讯,神交何异双绸缪。识丁君乃二十载,下上角逐忘春秋。丁君行矣龚子忽

有感,一官投老谁能留。珠联璧合有时有,一散人海如凫鸥。噫!
才人学人一散人海如凫鸥,明日独访城中刘。

定庵诗中称美的人物,皆为常州名族,在学术研究和辞章创作上堪称一时之选。其中丁履恒,字若士,一字道久,号冬心,为清代著名诗人和朴学家,与段玉裁、卢文弨、李廷敬、庄述祖、张惠言、恽敬等情在师友之间,同时与邑中洪亮吉、刘嗣綰、陆继辂、黄乙生等时作文酒之会,联唱相和,著有《思贤阁文稿》、《思贤阁诗稿》、《宛芳楼草》等,谭献《篋中词》称其“气体高妙”。又有《毛诗名物志》、《说文谐声类编》、《左氏通义》等。履恒有族兄履端,字端久,号郁兹,也是邑中能诗者,与洪亮吉、孙星衍、赵怀玉、杨梦符交游,晚年与李兆洛、刘嗣綰、陆继辂等齐名常郡。此外,丁履恒为庄绶甲姊婿,且于绶甲终身师事之,而绶甲之妻为刘逢禄“从女兄”,即堂姐。丁履恒极好交游,乾隆五十四年(1789)曾与陆继辂、洪飴孙(孟慈,亮吉子)、李兆洛(申耆)、周仪诤(伯恬)等订交。可见,仅仅以丁履恒为中心展开“文学圈半径”,就可以看到多少清代常州著名文人!

考察常州这个名士部落,还可以注意一下“草堂诸子”和“同车图”的相关资料。草堂诸子是指经常参与江阴祝百十爱日草堂聚会的十二位常州文士,他们是周仪诤、张惠言、张琦、祝百五、陆继辂、陆耀遹、庄绶甲、刘逢禄、洪飴孙、丁履恒、李兆洛和祝百十。“乾嘉之际,士皆尚文章,驰骛声利。于时常州独多文士,而草堂诸君子独以立身砥行,时相磨切,风向为之一变”(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一卷)。《同车图》系道光三年(1823)张怀白绘,题材为前一年常州管氏家族名士管绳莱与十三友人出游的生动情景:

露车一辕,中马,左驂驴,跨驴而从者三。车之中白须中坐者子常,仰而与语者卿珊;青兜蔽耳、侧坐露半面者宛邻,若士对之,举手若相语;若士之后,左山子、右彦闻;绍闻背宛邻坐,捻须若有所思;善之坐右辕,回首与伯恬语;孝逸曳一足,坐左辕,若与驴背人相盼也;驴傍车而稍后,前为彦惟,后则赞卿、竹吾并而语,竹吾拄鞭若听者;驭夫结束,傍右辕而趋,扬鞭而顾,若指示车中人者,

为保绪。

据李兆洛《同车图记》知同游者为祝百十、张绮、丁履恒、陆耀通、庄绶甲、周仪玮、管绳莱、魏襄、周济、吴育、张成孙、方履钱、康兆奎、鲍继培。对照一下可以看出，龚自珍的“常州高才”行列中的好几位都属“草堂诸子”，而他们大多都坐在道光二年出游的车上。而这是一个多么可观的清代文人阵容啊，如果将他们的前辈和师友作一番想象性的关联，常州的这部“文化巨车”是何等壮观！

常州是清代诗歌创作的重镇，查慎行《续毗陵诗录》有“毗陵诗国千年事”之谓，可见历史源远流长。袁枚《仿元遗山诗论》说“常州星象聚文昌，洪顾孙杨各擅场”。清代的常州“文昌星系”相当庞大，除了洪亮吉、顾敏恒、孙星衍、杨芳灿，当然还有赵翼、黄仲则等，还有毗陵诗派、阳湖诗派、梁溪诗派中的其他人物。另外常州女性作家群队伍浩荡，可以与之争胜的地区更有限了。

然而，正如梁启超所说，“常州在有清一代，无论哪一门学问，都有与人不同的地方”。常州人赵尊岳序《刘氏清芬录》有云：“诗、古文、词，数百年来固吾郡所独著，世号‘常州宗派’。”赵氏提到了常州古文，未及骈文。而屠寄在《国朝常州骈体文录》之《叙录》中曾总括其成就：“乾隆、嘉庆之际，吾郡盛为文章。稚存、伯渊齐金鞵于前，彦闻、方立驰玉轶于后。皋文特善词赋，申耆尤长碑铭。诸附丽之者，亦各抽心呈貌，流芬散条，亶亶乎文有其质焉！于时海内属翰之士，敦说其义，至乃指目阳湖以为宗派。”这里勾勒出的清代常州文章发展小史，已足可令人称羨。

这些年，我有意识地要求研究生关注清代常州文学家族和作家群体，适当选择毕业论文题目进行探讨。在路海洋选择博士论文的题目时，我建议他进行清代常州的古文与骈文研究，去啃一块比较硬的骨头。我对海洋还是有信心的，因为他骨子里喜爱古典文学，喜爱古典文学研究。

说起来很有意思，海洋当年考入苏州大学就读的是新闻传播学专业，在他大四的时候，我正好为文学院的学生开一门唐诗学方面的选修课。每次上课总会看到一位同学坐在最后一排，点名时我才知道是

“多”出来的一位,他就是海洋。他告诉我说并没有选修这门课,是来“蹭课”的,不过倒是从不缺课。时间长了,我也就视其为选课生,偶尔让他回答问题,居然颇得要领,悟性甚嘉。这一轮课“蹭”下来的结果是,他毕业时放弃了当时非常容易就业的新闻专业,报考我的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读了两年,因为成绩优异而获得“直升”的机会,继续跟从我攻读古代文学明清诗文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

若问高校导师与研究生是什么关系,我的理解是“两相须”、“两相待”,对我们从事古典学术的学者来说,感受尤其深刻。古典学术研究,是一个需要沉潜,甘于寂寞的事业。如果说研究生选择导师包含了某种学术需要和期待的话,作为导师又何尝不需要一心向学的研究生,不对他们充满期待呢?老实说,当今古典学术后继乏人,真正对这门学科有基础,有感情,有愿景,而又乐意在无垠的荒野中长期跋涉的年轻人并不多。所以对海洋“自投罗网”,从本科一直到博士阶段都执著地热爱古代文学,研究中古、近古诗文,我是深感,并寄予信心和希望的。

海洋在读博期间颇下工夫,这一点我们文学院不少老师和研究生都能见证。他选择清代常州古文和骈文进行研究,很有难度。其难度不仅仅要分别对清代常州之“古文”和“骈文”进行研究,既进得去又出得来,而且要建立起社会、地域、家族这三个维度,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中展开对文体的研究,做到理论与实证的融贯。这对海洋来说是一个挑战,但他终于很好地完成了这一学术任务。

摆在我面前的这部书稿是在毕业论文基础上进一步修改打磨而成的,读之心生喜悦。海洋通过深入扎实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对清代常州地区的社会历史、地域环境、家族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同时对一定时空中的文学群体、文学家、文学作品展开了深入细致的个案分析,理论架构与学术话语有创新性和个性感,既能承接前人研究之成果,也能突破现有结论,开辟新境界。书稿中对社会、地域和家族的研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背景,本身就具有了一定的理论自足性,这种相对自足的理论文体研究之间能融会贯通,使全书具有了整体感和新颖性,而细细品读,许多个案也很能让人会心感悟。

当时进行毕业论文答辩,王水照、董乃斌等先生都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后来以之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获得立项,作为导师我是深感欣慰的。当然,地域与家族研究近些年才引起学界关注,许多理论问题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另外,骈文是一种具有一定格式化的文体,如何在研究中走出格式化,还有可以进一步提升的余地。从本书的“余论”,我们可以了解到海洋对这个课题学术把握的宽度和深度,以及开拓创辟的雄心。从去年起,他担任了一些行政工作,为了不影响科研,他比以前更加勤劬。海洋正处于最富于青春,富于朝气,富于创造的年华,以他现有的学术基础,加以敏智与勤劬,是一定能在古典学术研究上做出一番事业来的。我像过去期待他的今天一样,期待他取得更为丰硕成果的未来。是为序。

2014年3月写于台湾逢甲大学,时任客座教授于此

目 录

序.....	罗时进	1
绪 论.....		1
第一节 清代常州古文与骈文研究范畴.....		2
第二节 清代常州古文与骈文研究现状.....		5
第三节 社会、地域、家族：清代常州古文与骈文研究的三个 维度		11
第一章 清代常州古文与骈文创作的地理人文背景		16
第一节 自然地理条件优越与常州文化繁荣		17
第二节 历史文化积淀与常州人文性格熔铸		21
第三节 学术兴盛与常州文学精神		29
第二章 清代常州古文与骈文发展的家族文化助力		47
第一节 清代常州家族文化诸种特征		47
第二节 常州古文与骈文创作群体的集合形式：宗亲与师友 交游		61
第三节 常州古文与骈文发展的推动力量		70
第三章 常州古文研究(上)		78
第一节 清代常州古文创作的总体局面		78

第二节 名族哲嗣,古文大家:恽敬	82
第三节 大南门寒族才俊,“阳湖派”古文宗匠:张惠言	115
第四章 常州古文研究(下)	131
第一节 “通脱”其人,“性情”其文:李兆洛	131
第二节 人每“伤心”,文常多情:陆继辂	143
第三节 志大运蹇,文章精华:张琦	154
第五章 常州骈文研究(上)	175
第一节 清代常州骈文之兴盛及其原因	175
第二节 一代奇俊,骈林巨子:洪亮吉	185
第三节 江左文学之望,常州骈体名家:孙星衍	206
第六章 常州骈文研究(下)	218
第一节 身世多慨,笔底流霞:刘嗣綰	218
第二节 博学奇才,骈体名手:方履篌	231
第三节 “二董”《合刻穆华馆骈体文》成就	238
第四节 古文“阳湖派”作家的骈文创作	251
余论 清代常州古文、骈文的文学史地位及其再研究的空间	264
主要参考文献	271
后 记	281

绪 论

清代文学发展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区域化态势,江南、岭南、秦晋、齐鲁、河朔诸地大量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诗文作家和文学流派的出现,就是很好的说明。在清代的区域性文学板块中,江南历来是学者重点关注的文学“首富区”,而常州府又是这一文学“首富区”中尤为引人瞩目的重镇。常州人赵尊岳序《刘氏清芬录》有云:“诗古文词,数百年来固吾郡所独著,世号‘常州宗派’。”^①如诗之“毗陵派”,古文之“阳湖派”,骈文之“常州派”,词之“阳羨”、“常州”二派,都是曾经推动、影响甚至引导、转变文坛风气的重要文学流派。清代常州文学中的诗、词两体,学界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但文(包括古文和骈文)特别是骈文的研究,则尚待进一步加强。

考虑到本书的宗旨并不是要写作一部系统的清代近三百年的常州古文与骈文史,而重点是要呈示常州这一特定区域中特定文体发展的主体面貌和鲜明特征,因此,本书将研究的视野聚焦在清中期或说兴盛的常州古文与骈文。同时,考虑到清代中期常州古文与骈文这两条线的发展是充分交互而非平行推演的,所以本书有别于《阳湖文派研究》、《清代常州骈文研究》等以单一文体为着眼点的研究思路,而将古文与骈文作为一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整体来观照。再者,与传统的作家、作品论研究思路相异,本书采用社会、地域与家族视角交叉并用的方法,对清中期常州的古文与骈文进行立体而深入的探讨。这是本

^① 刘祺编辑、刘继丰校订《武进西营刘氏清芬录第一集》卷首。

书的三个特色。

第一节 清代常州古文与骈文研究范畴

本书研究的范畴,大体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界定:时间上,主要限定在清中期,包括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空间上,以常州府阳湖、武进两县为发源地,延展到全国范围;创作群体,限定为常州府阳湖、武进籍作家,实际是以古文“阳湖派”与骈文“常州派”代表作家为主,兼及阳湖、武进籍其他重要作家;创作内容,为诸家的古文与骈文作品。

具体而言,时间上的框限,是依据常州古文与骈文主要作家的生活年代、特别是他们文学交游与创作活动的时间范围来确定的。常州古文代表作家恽敬、张惠言、张琦、李兆洛、陆继辂、董士锡诸人,大体生于乾隆中后期,卒于嘉道间,主要创作则集中于乾隆后期、嘉道间。骈文代表作家,大体分前后两期,前期刘星炜生活年代略早,生于康熙末年、卒于乾隆末年,其余洪亮吉、孙星衍、赵怀玉、杨芳灿等,则生于乾隆前期、卒于嘉庆间,其主要创作集中于乾隆中后期、嘉庆初;后期代表作家刘嗣绾、方履箴、董基诚、董祐诚诸人,生活年代与文学创作活动时间,大体皆与古文代表作家相似。依此看来,常州古文与骈文的兴盛期,即在乾嘉道三朝,本书以兴盛期的常州古文与骈文为研究对象,故以乾嘉道三朝为时间限约。

空间范围的划定,是以常州古文与骈文主要作家的交游与创作所涉地域为依据。常州作家间因为地缘的相近、血缘的相亲、兴趣的相投,有着丰富的文学性交游,其交游的区域空间,除了诸人的出生地、文学生涯的发源地常州府,还包括随着他们生活轨迹的延展而扩大所及的众多地域。最典型的如恽敬、张惠言、庄述祖、庄献可诸人,曾在京师“商榷经义古文”^①,而这一事件乃是“阳湖文派”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则京师固然应当视为常州作家交游的重要场所。同时,诸人生活轨迹的延展,往往就是其创作生涯的延展,或寓幕依人,或赴考羁旅,或四海

① 吴德旋《初月楼文钞》卷8《恽子居先生行状》。

壮游,或膺命宦居,每到一地,命笔作文,这是诗人墨客常有之事。比如洪亮吉一生笃好奇游,足迹几遍天下,其骈体作品,很大一部分即写于游历途中;又如董祐诚迫于生计,游幕陕中,他的绝大部分骈体作品都写于客游期间。那么,他们文学生命的空间,应当包括故乡以外、游踪所及的广大地域。但说到底,不管常州作家们游历寓居多久、多远,他们的根还是深扎在常州的乡山故土之中,因此文章将研究的空间,设定为以诸人故乡阳湖、武进为发源地、汇聚点,包括他们足迹所至的全国广大范围。

创作群体之所以限定为阳湖、武进籍作家,主要是因为常州古文与骈文的创作主体,几乎全部隶属阳湖、武进。常州古文的主要成就,由“阳湖派”一派完成,其领军为恽敬、张惠言,其余代表作家为李兆洛、陆继辂、张琦与董士锡,而丁履恒、陆耀通、祝百五与祝百十兄弟等,也是比较重要的创作者。此外,常州府古文值得一提的作家,还有洪亮吉、孙星衍、赵怀玉、庄氏一族(庄存与、庄述祖、庄绶甲、刘逢禄、宋翔凤)、储氏一族(储欣、储方庆、储大文)等,其中洪、孙、赵实为“阳湖派”先导,庄氏一族虽以学术名世,而古文亦有创获。查诸人籍贯,除储氏一族(宜兴县人)、祝氏兄弟(江阴县人)外,其他诸氏俱为武进、阳湖人。

常州骈文的创作,大体分前后两期,前期作家以刘星炜、洪亮吉、孙星衍、赵怀玉、杨芳灿为代表,其中洪、孙成就最高,他们也是所谓骈文“常州派”或“常州体”^①的魁首;后期刘嗣綰、方履篈、董基诚、董祐诚四人为一时骈体名手,成就固高,其余古文“阳湖派”张惠言、李兆洛、陆继

① “常州派”或“常州体”,是清代以来对洪亮吉、孙星衍为首的骈文流派的概称。主要成员除了洪、孙(俱阳湖人),还有杨芳灿(金匮人)、刘嗣綰(阳湖人)、曾燠(南城人)、彭兆荪(镇洋人)、李慈铭(绍兴人)等,所为文章以清新为鲜明的风格特色。如民国学者刘麟生在其《中国骈文史》中论清代骈文“常州派”云:“洪亮吉与孙星衍齐名,皆为常州人,所为骈文,以轻情清新取胜,世有常州体之称……常州作家稍后起者,为刘嗣綰,造句遣词,专以轻情取胜。”并举嗣綰《潘君妻周孺人诔》中一联,批评其文有“琢句纤巧”之弊,继云“当时作家,如杨芳灿、彭兆荪、曾燠诸人,及清末之李慈铭,均不免有此结习也”。我们从文章的章节设置、意脉推进及所举洪、孙、刘、彭、李等人的骈文例证来看,刘麟生是将刘、杨、彭、曾、李诸人都视作“常州体”或“常州派”作家的。又如张仁青《骈文学》论(转下页注)

格、张成孙、董士锡诸人,及洪符孙、洪畴孙兄弟,也颇有创获^①。其中除杨芳灿为金匱人,此外诸人皆隶籍阳湖、武进。故本书将常州府阳湖、武进两邑代表作家的古文与骈文创作作为研究对象,以展示清中期常州古文与骈文创作的主体成就。

本书所谓古文与骈文的概念,开篇须略作界定。众所周知,唐以前,文章并无古文与骈体之分,有此分别,是在“古文运动”以后,正如李兆洛《骈体文钞自序》所云:“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俪。”^②所谓古文,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的界定比较简洁、准确,那就是“韩愈等人针对‘时文’即魏晋以来形成、至初盛唐仍旧流行的骈体文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先秦两汉时单行散句、没有规定形式的文体”^③。而所谓骈文,大体就是偶行整句、讲求用典敷藻与格律声韵、有相对固定形式的文体。这样的概念,后世沿袭,本文也因而将研究内容划分为古文与骈文两个方面。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来,那就是源于先秦两汉而清人沿用的辞赋之体,应归入古文还是骈文?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辞赋”进行具体分类,按照通行的分法,赋体包括先秦两汉盛行而后世沿用的古赋、经魏晋六朝人改造与发展的骈赋以及“唐宋时代和以后应试用的非古式的律赋”^④等三个类型。其中第一类的古赋,“桐城派”大师姚鼐编《古文辞类纂》,是将其归入古文,当今学界则将其视为一种介于诗文之

(续上页注)洪亮吉与“常州体”有云:“洪亮吉所为骈文,格调纤新,笔致轻倩,世有‘常州体’之称,稍后之刘嗣綰、杨芳灿、彭兆荪、曾燠、李慈铭专学之,影响殊为深远。”就说得更清楚了。引文分别参见刘麟生《中国骈文史》,第127-12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张仁青《骈文学》,第543页,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4。

① 如张寿荣《后八家四六文钞》将张惠言、李兆洛、董祐诚与乐钧、王昙、王衍梅、刘开、金应麟八人,并称为清代后期最有代表性的骈文家;而王先谦《国朝十家四六文钞》,则将方履篈、董基诚、董祐诚,排在清代后期十位最有成就的骈文家行列中。

② 屠寄辑《国朝常州骈体文录》卷13。

③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中册),第18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④ 钱仲联《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总序》,见钱仲联主编、严明等选注评点《张惠言文选》卷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

间的特殊文体,不管怎样,古赋固然不应划入骈文。第二类骈赋和第三类律赋,都是在古赋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式”辞赋,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使用对偶修辞格、都讲究声律和藻采,很大一部分这两类作品还注重用典隶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必要将它们视为骈体之文。清代骈文家如常州张惠言、陆继辂、张成孙、董士锡、董基诚、董祐诚等人的赋作(主要是骈赋,律赋很有限),体制上虽存楚骚、汉赋之风,但从其核心特征即句式的整饬、声律和藻采的讲求、运典的丰富上看,应视为骈体文,这也是屠寄纂辑《国朝常州骈体文录》选录诸家赋作的原因。

第二节 清代常州古文与骈文研究现状

清代常州的古文与骈文有着很高的成就,这自清代以来就是学界的共识,但学界对它们的研究却颇为不足,而就既有研究成果来说,对古文的研究显然要多于对骈体的研究。

古文方面,论者集中以“阳湖派”为对象,展开了不同程度的论述、研究。清人在各种文献中,已常有涉及“阳湖派”的文字,如张之洞撰《书目答问》,专门列出“阳湖派古文家”一目,视恽敬、张惠言、陆继辂、董士锡、李兆洛为代表作家,以与“不立宗派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家”并举^①;又徐珂《清稗类钞·文学类·阳湖文派》,认为“桐城、阳湖,名为两派,其实同源”,并指出“阳湖派”实从“桐城派”衍出^②;又姚鼐后裔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卷2《派别》,强调指出张之洞将清代古文家分为“桐城”、“阳湖”和“不立宗派”三派“尤不足据”,认为“阳湖”源出“桐城”,并且实际是“两派合而不分”的^③;钱基博的观点则与徐、姚二人相

① 张之洞撰、范希增补正、高明路点校《书目答问补正》附录《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第257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② 徐珂编辑,无谷、刘卓英点校《清稗类钞选·文学类》,第38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③ 姚永朴著、许结讲评《文学研究法》,第72-74页,凤凰出版社,2009。

异,他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指出,“阳湖派”虽源出“桐城派”,但两者有很大的不同:“盖桐城之文,从唐宋八家人;阳湖之文,从汉魏六朝人。迨李兆洛起,放言高论,盛倡秦汉之偶俪,实唐宋散行之祖;乃辑《骈体文钞》以当桐城姚氏之《古文辞类纂》;而阳湖之文,乃别出于桐城以自张一军。”^①即阳湖古文已然跳脱“桐城派”的樊篱,自成一派。此外,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例略》^②、马其昶《清史文苑传序》^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④等,或多或少,都曾就“阳湖”、“桐城”两派的关系有所论述。这一类观点,或有精到之处,如张之洞对于“阳湖派”的定位,对“阳湖派”代表作家的认定,钱基博对于“桐城”、“阳湖”二派的关系及其古文创作不同之处的论析,到目前也是十分值得借鉴的,但是它们多是只言片语,未曾展开详细的探讨,这也是初期阳湖古文研究的基本特点。

民国以降,论者对“阳湖派”的研究渐趋深入,大体可分五个方面:一是对“桐城派”、“阳湖派”关系的探讨;二是对“阳湖派”作家群体的考证确认;三是对“阳湖派”代表作家文学思想的总结;四是对“阳湖派”创作的整体风格特征进行概括;五是较为系统全面的“阳湖派”研究。

第一类对“桐城”、“阳湖”两派关系的讨论,参与者颇众,姚华《弗堂类稿·论著甲·论文后编》、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章宗祥《中国大文学史·清代文学》而外,郭预衡《中国散文史》、蒋逸雪《试论阳湖文派》及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等,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其具体内容,将在本书余论部分展开详细论述。

第二类对作家群体的研究,以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⑤、陈光贻《阳湖派主要作者简介》^⑥为代表。根据他们的罗列,“阳湖派”的作家群体,基本可以确定。但是像刘声木的考论,前提是将“阳湖派”完全视

① 钱基博著、傅道彬点校《现代中国文学史》,第1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② 参见王先谦辑《续古文辞类纂》卷首。

③ 参见马其昶《抱润轩文集》卷5,民国十二年刊本。

④ 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2页,上海三联书店,2006。

⑤ 参见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黄山书社,1989。

⑥ 见《江淮论坛》,1983年第1期。

为“桐城派”的内部流衍,这一点是不可取的。

第三类以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为代表。郭书特别强调恽敬文学理论的意义,认为“阳湖文论,除恽敬外,无可论述”^①,并对恽敬的文学观、论文标准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勾勒,这也是迄今为止有关恽敬文学思想最为深刻的论述。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亦专列“恽敬”一节,对恽敬论文的相关重要文字,有较多的引述,但是文义隐约,缺乏明确的提升总结^②。郭、朱两书虽然都强调了恽敬文学思想对于“阳湖派”的重要意义,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就是忽视了恽敬以外“阳湖”诸家如张惠言、张琦、李兆洛、陆继辂的文学思想的研究,郭书对二张、李、陆诸人是一笔抹倒,朱书虽将张惠言与周济专列一节,也主要是强调惠言在词学思想方面的贡献。而我们读二张、李、陆诸人的文集,他们都有比较系统的文学理论主张,因此,这一方面亟待纠补完善。

第四类以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王起等《中国文学史》,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为代表。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虽然认为“阳湖派”乃是“桐城派”的旁流,但是对“阳湖”之所以区别于“桐城”的原因进行了探究,他总结为两点,一是“他们一面作古文,同时又喜作骈体”,二是“他们除取法六经八家外,同时兼取子史杂家”^③,前者讲古文作法,进一层来说,实际就是“阳湖派”骈散融通的创作思路,后者则是讲他们古文的取法路径,这是颇为深刻的见解。游、王等人的《中国文学史》,也概括出“阳湖”与“桐城”之文所存在两点差异,一为取法的广泛,二即作法上的散中兼骈,思路与刘大杰极似,可谓英雄所见略同^④。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的论述则较刘书与游国恩、王起等书更为系统,他们总结出“阳湖派”文论的三个特色,即博

①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587页,中华书局,1961。

② 参见朱东润撰、章培恒导读《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第374-3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③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第25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④ 参见游国恩、王起等《中国文学史》(四),第3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